

“宁粤合作”亲历记

自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后，国民党已走上反苏、反共、反人民的绝路，致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愈益无所顾忌。迨至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，惊醒了中国人民，唤起了大众的民族意识的觉醒，同时也震撼了国民党及其内部派系——蒋介石、汪精卫、胡汉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。这一事件，曾迫使蒋介石宣告下野，孙科上台又下台，蒋、汪合作，胡汉民一去不返。接着发生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。

“宁粤合作”之前，有一段分裂过程。这一分裂与我在广东有关，故先从我在广东说起。

我在广东

一九二九年春，我任广东省政府主席，陈济棠任第八路军总指挥，分掌广东军政。自打退张（发奎）、桂联军进犯后，统一了广东全省，并占据了梧州，扼制着广西唯一通向海口的咽喉。陈济棠在最短的时期内，随着军事胜利的进展，把兵力由原有一个师（第十一师）迅速扩充为五个师，并控制了驻广东的空军和海军陆战队。我于一九二八年由闽回粤时，所属的第十一军有蔡廷锴的第十师、黄质胜的第二十四师，后又恢复第二十六师，戴戟任师长，蒋光鼐仍任副军长。

先是，北伐军攻克平、津，全国除东北外，形式上已具统一雏形。其时我驻广东南路，于琼州军次通电全国军人，倡议裁军，拥护统一，力主军权归还中央。后又北上，在香港与胡汉民（胡方自欧洲回）同赴沪，企图以裁军主张游说各方。抵上海与李济深同住诣昌年家，晤李宗仁，他讥诮我是傻子，并郑重地对我说：“当今治天下非我们军人不可，长衫客，（指文人）是不行的。”到南京见蒋介石，他对我的主张当然很喜欢。到北平晤白崇禧，见其气焰之盛，使我对裁军问题不能开口。盘桓几天后，又在天津与傅作义见面。后取道武汉返南京，复与李宗仁见面。我已知李、白同一鼻孔出气，无必要再向他们谈裁军问题了。但我并不因游说无成，放弃自己原来的倡议，故在南京编造会议前夕，即致电陈济棠、蒋光鼐，嘱他们拥护裁军方案，并自动将所属第十一军的三个师，缩编为一个师，一个独立旅。蒋光鼐一任广东编遣区第三师师长，戴戟任副师长，蔡廷锴任独立第二旅旅长，裁去戴戟之二十六师。半年后，蔡旅改编为第六十师，蒋师改编为第六十一师，因历史关系，名义上两师虽不相隶属，但实际上仍由蒋光鼐统率，教育作战，未曾稍事分离。我自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，第十一军军部即撤消，蒋蔡两部归陈济棠节制。省政府有保安团四团，分驻各县，负地方绥靖之责。

我同陈济棠在广东，虽是军政分治，但因陈是我早年在“阳江起义”时的旧部，共事有年，故他对于重要的军事问题，不仅要我替他策划，并且要我为他部署作战。中间有几次较大的战役，如一九二九年冬，在花县与张、桂军作战，就由我计划，并亲到前线布置。

战斗结果，张军被击溃，桂军亦撤出逃逸。从此结束了广东境内的粤桂战争。

其时，我鉴于富庶之区，军队驻防过久，容易腐化堕落，且两个自成系统的部队（我部与陈济棠部）同在一起，日久必会发生摩擦，甚至引起权利之争。况蒋、蔡两师将士，正锐气方刚，大足有为，自应面向全局，不宜安于现状，留恋桑梓。故当省内战争结束后，我即将此意向蒋、蔡说明，要他们恺切转告全体将士，作好精神准备，随时候命出发。

一九三〇年夏，蒋介石与冯、阎大战于中原，战事剧烈。我电蒋说：“蒋、蔡两师已作好准备，随时可听候调遣。”不久，张、桂军乘机再起，直入湖南，图出武汉与冯、阎相策应。时武汉空虚，南京震动，蒋介石急调蒋、蔡两师出韶关入湘，以蹶张、桂军之后。时张军已占领长沙，桂军（由黄绍竑、白崇禧率领）已抵浏阳，闻我军动向，忽变更计划，回师应战，且有夺取广东意图。我闻讯，即与陈济棠会商，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，以陈部李扬敬师归蒋指挥，驻桂接应；并决定由陈济棠亲率余汉谋、香翰屏两师为后续部队。时蒋、蔡军次耒阳，白部前锋已抵茶陵，预计两日内，双方即将遭遇。因敌我众寡悬殊，而李扬敬师刚越过大庾岭，此正军事机动关头，我正筹算未决，忽接蒋光鼐电称：“拟将兵力移向左侧方，扼守衡阳，撤去后方，使敌扑个空，然后与后续部队夹击敌人。”我心所踌躇者，至此始得解决，立即找陈济棠商量。殊他不同意蒋光鼐的计划，定要将部队撤回大庾岭，在九峰，坪石一带布防，凭险固守。我再三解释无效，乃即直电蒋电蒋光鼐说：“你的计划好极，我军撤移衡阳，拊敌前进侧背，如猛虎在山，虽属险着，的是妙算。陈总指挥要你退回，是行不得的！万勿变更原计划。”我电未到，蒋光鼐已接陈电，即电我说：“陈总指挥来电，真使人头痛，我不能接受。”我再复电说：“前电此时谅已收到，兄此着诚妙，歼敌必矣！谨先预贺，静候捷音。”结果张军惨败，几乎全军复没，黄、白所率桂军，也狼狈退回广西。战事刚结束，蒋、蔡两师即被调到津浦线与阎军作战，出奇兵克济南，正式改编为第十九路军，蒋光鼐任总指挥。后蒋光鼐又亲率两师突出平汉线，与冯军作战，大胜。战事结束，又被调到江西与红军作战。至我到江西就任“剿赤”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时，始重领该军。回溯过去种种，都成罪过，十九路军之转战南北，只有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。

正如上述，广东为富庶之区，税源甚丰，蒋为笼络陈济棠，并使粤军替他看守桂系，故指定以中央在粤税收，全部拨给陈作军费，连同省收入项下拨给的一部分，每月共达四百三十万，加上广西梧州税款，共达五百万以上。按当时中央规定，每师军费为三十万，陈只五师，加上每月对出省部队（蒋、蔡部）最小部分的协饷，超领经费极为庞大。因此为中央规定，我亦不甚注意。同时，我亦弄了一批钱来做我想做的事，如以巨资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，筹办广东艺术学院和大剧院等等。陈在我职权范围内的政务，从未干涉，因我同陈根本不存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。

其时，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在广东的胡派人物。自张发奎、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，汪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。胡派在粤势力最雄厚，党政军学各派都有。其代表性人物为古应芬、邓泽如、萧佛成、林云陔，李文范、刘芦隐、胡毅生（胡之胞弟）等人，都以国民党元老

自居，奉胡汉民为正统。按当时藏否人物之说，这些人亦有清浊之分，清者如林云陔、李艾范、刘芦隐等人，尚有刚劲之气，且能廉洁自律。浊者如古应芬等人，常凭借资格，利用政治背景来朋比为奸，结党营私，我同文范都极尊重胡，并爱护胡的声誉，故不徇所求；又因蒋、胡两次合作，都曾由我主动斡旋，故深愿由此提高胡的威望，以利国民党的统一巩固，自信动机纯正，故亦不以此介意。不料竟因此而开罪了胡家，并遭到大部分胡派的嫉视，因而他们捧“扮猪吃老虎”（广东土语）的陈济棠同我对立。后来又引进了他们过去的“眼中钉”汪精卫，终于酿成宁粤分裂的局面。

宁粤分裂前后

一九三一年二月，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。消息传到广州，军政各界都极震动，且大惑不解。一时谣诼繁兴，纷纷揣测不一。不几天蒋由南京来一通“解释误会”的电文，说：“胡展堂先生对国民会议，坚持主张不得议及约法，恐因此引起党内无穷纠纷，俭（二十八）晚特与详细讨论，胡先生以政见不合，欲辞本兼备职，并欲择地静居，谢见宾客，故于本日往汤山暂住。乃闻谣传扣留，殊觉失实。”此电文欲盖弥彰，反证实了胡确已遭遇和李济深相同的命运，在汤山被囚了，大家相对时，无不怒形于色，都以行政院长（时蒋兼行政院长）扣留立法院长，毁法乱纪，中外所无，纷纷表示愤慨。

胡与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，而我及粤军将领又多李之旧属，感情自然容易冲动，加以胡派首脑古应芬等，又到处点火，不久就掀起了反蒋高潮。当时我对蒋独裁之不满，以及对胡、李的爱重；并不下于其他军政人员，但以中央扣留一两大员，就要兴师动众，分裂对立，这种想法在我脑子里是不存在的。如上年李济深被扣时，粤军将领亦纷主用兵，胡同我均不同意此举。我曾公开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如果因李总长（李时任参谋总长）被扣而用兵，对他并无丝毫好处，反而坐实了他勾结桂系、拥兵自卫（蒋扣李时所加的罪名）的罪名。”几经疏解，始免了那场干戈。

在此局势动荡不安之际，我曾电在江西的蒋光鼐、蔡廷锴，征询他们对于反蒋的意见。他们复电表示：“拥护统一，反对内战。”这就坚定了我的主张。为了缓和空气，我借故出巡各县，拟俟诸人情绪平复后，再从长计议。不料在我出巡期间，陈济棠信使四出，古应芬又同我的朋友黄居素勾搭起来，黄公然说：“对陈真如暂不必征其同意，等我们酝酿成熟，布置好了，他就会跟着走。”我闻讯，极为激愤，心想这不是要做成圈套来套我吗？我立即回广州，开始仍图挽回局势，但古、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，情况极为复杂，且已到箭在弦上，有不得不发之势。这与我初衷不合，故即悄然离开了广州。

我到香港后，广州局势突变，不几天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。四月三十日，四监委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）邓泽如林森、萧佛成、古应芬（时林、萧两人尚在国外）以通电形式发表“弹劾蒋中正提案”。五月三日，陈济棠发表响应通电，接着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张发奎、唐生智亦发出响应通电。先是，孙科曾以调解宁粤争端为名南下，到港后突与汪精卫合流，并相继进了广州。二十七日，广州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，通过国民政

府组织大纲，推唐绍仪、汪兆铭、萧佛成、邓泽如、孙科、邹鲁、许崇智、林森、古应芬、李宗仁、陈济棠、陈友仁，李烈钧、熊克武、唐生智、蒋尊簋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，成立国民政府。二十八日，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告，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即行引退。

五月初，我尚在香港，住九龙半岛饭店，省保安队第四团团长翁照垣来见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只要主席点头，我回去把陈济棠干了！”我说：“这使不得！我之离粤是为了避免纠纷，并不是对陈济棠有什么私人仇恨，过去对张发奎自相残杀的历史，万不能重演。”他又说：“如陈来打我，就要同他拼到底，即使只剩一枪一弹，我也不屈服。”我说：“你回去看情况再说吧。”其时，我对粤局深感不安，恐他们因我在港未远离，容易发生误解，故对记者发表谈话说：“本人对职务毫无留恋，此后欲赴日本、印度及南洋群岛考察经济、政治。”九日我就到上海，原来尚拟到南京一行，后因得朋友之约，即变更计划，提前赴日本旅行。在日期间，迭接广东方面消息，知陈济棠曾使用武力解决省保安队，缴了琼州黄固团的械，继又使用陆、海、空军与顽强抵抗的翁照垣团激战于黄埔，翁弹尽时始泅水搭轮赴港。我即致电责陈说：“粤省保安队数千人，保卫地方，无关权位得失，竟欲灭之，毁民保障。若以枢去国为未足，为此而泄愤，则非枢所敢闻也。”陈自解决省保安队后，亦自相惊扰，一面给我复电，解释“误会”一面又派他的师长香翰屏到赣州游说蒋、蔡，请守“中立”。蒋、蔡答以拥护中央解决粤局的方案。陈见计不得逞，乃调李扬敬、余汉谋两师开往韶关，在南雄、仁化一带，布成三道防线；又调香翰屏师扼守惠州、河源一带，实行军事戒备，以防十九路军的回粤。

我与蒋介石的勾当

我在日本住了二十几天，即取道长崎回国。因上船时避过日警探注意，行踪甚秘，故回上海后，蒋介石才知道我已回国，立电邀见。时我已得赣州消息，知十九路军全体，在此局势混沌时，有旁皇无主状况，急图回入军队，故即应蒋召入京，初并无任何打算。抵南京后，蒋见我欢喜异常，当天即将他悬而未决的腹案告我，即：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，将部队集中吉安，并要我担任“剿赤”右翼军总司令官。他并对我说：“‘共匪，不是短期可消灭的，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，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。”不难看出，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，还在于图粤。我明知十九路军将士不愿内战，而我自己也无染指广东的意图，但因急于回军，故只得姑且应允，俟时机成熟，再作良图。这是我当时打定的主意。计议既定，我就准备到江西去指挥军事了。

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，突接到蒋的电话。要我前往晤谈。时蒋住在中山陵园“官邸”，‘我去时，他从草坪上走来迎接，亲切对我说：“你明天就要出发了，我们随便谈吧！”其时院内和坪地四周，静悄悄地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只有他同我两人坐在草坪的藤椅上。我初尚不介意，事后才明白，这是他事先作好的密谈安排。

两人入座后，蒋先开口了，他带着几分喟叹的口吻说：“革命大业的创造，还很艰难，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，‘赤祸’又来，而我们党内各地同志，又各怀异心，隐患重重，现

在又临到多难的时候了。”谈至此，他加强语调说：“今日必须仗忠义之士，精诚团结，作为中央骨干，同心协力，生死以之，才能奠定国家，巩固统一。”他稍停顿了一下，我立即发现其用意所在。果然，他并不转弯抹角，直接了当地说：“国家前途的担子，已经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了，我们义不容辞，要负担起来，就必须合为一个整体，成为不可分的巨大力量。”他望着我又说：“我想到此，我两人可以效法刘、关、张桃园结义的故事，你以为如何？”他把话说完，就倒在椅上静待我的回答。我听了他这一席话，顿时想到：——你早几年（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时）由徐州败退下来，我与你同在一列火车并同在一个车厢，你对我殷勤备至，你草拟下野通电，表示引咎。我趁你失意时，进行忠告，很委婉地提出：你在上海拜青帮头子黄金荣为师，同杜月笙，张啸林等拜兄弟（后又同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等结拜金兰），这些作风同时代并不适合。你现在又用这手法来套我，我怎能受你的套呢——旧的回忆和新的感受，一齐涌上心头，不到一分钟，我立即用严肃的口吻对他说：“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，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总司令！你现在是国家元首（国府主席），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（陆海空军总司令），只要你能开诚心，布公道，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，自然四海归心，一切忠义才智之士，都会不待招而自至。倘若不然，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，将示人心不广，反决定对你的向背？”我的话不啻泼了一盆冷水，他听了气氛顿改，沉静了许久，找不出一句话来对我表示。我呆了半晌，觉得彼此都很窘，乃即告退。第二天，我乘飞机到了江西。六月十一日，我到赣州后，即同蒋光鼐（时他已到沪养病）、蔡廷锴、戴戟等联名发出通电，一拥护中央统一，同时就任“剿赤”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职。十四日，我致电陈济棠，提出三点。（一）请古应芬交出政权，迅即离开广州，（二）恢复以前之保安队；（三）省通运公司及禁烟局维持四月前现状，以维持保安队原来经费。在此期间，我同汪精卫文电来往，互相责难，我的主要精神不外：反对内战，拥护国民党中央统一；力求党内团结，一致对外；特别对于反共之坚决，跃然纸上，如我的电文中有“誓与共党决最后之命运”等句。汪的回电，则以“剿共必倒蒋，倒蒋必剿共”立论，但又有“蒋之扬言剿共，果能实行，则此间决不以一矢相加”等语，足见国民党内部，虽然有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但在反共问题上，仍属“一丘之貉”。自我到赣州后，粤方深感不安，他们也料到蒋将利用我图粤，故汪致我的电中又说：“若借剿共之名，入寇广东革命根据地，则此间武装同志，固已严阵以待矣。”当然这是一种姿态。

七月中旬，我将十九路军集中吉安，总司令部又将右翼各军如陈诚、卫立煌、上官云相、郝梦龄、赵观涛等部，拨归我节制，统率部队虽多，能战者甚少，且蒋本人常直接下令给各军、师长，名虽归我节制，实际不归我指挥（例如韩德勤一师，未通知我被调往进攻红军，至被消灭时始接到该师的“呼救号”，尚不知其陷在何处）。只有十九路军所辖的三师（原有第六十、六十一两师，后又扩编第七十八师）在我掌握，且较有战斗能力。

我入赣后不久，已深深感到：对红军作战不易；十九路军长期转战，兵力渐感疲敝；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，日军蠢蠢欲动，强邻压境，东陲堪虞，蒋对军事指挥，亦复低能，

加以私心太重，赏罚不明，如他的嫡系蒋鼎文，屡吃败仗，不惟不受处分，且不次擢升，渐跻方面。环顾内外形势，使我不能不重新考虑问题——主要是怎样使十九路军摆脱目前处境，并怎样避免对广东的军事冲突。

我与邓择生（演达）是同学、同事，向来交谊甚笃，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，同甘共苦，关系尤为密切。虽然他早已同蒋对立，势如水火，但他同我仍保持旧交，且经常密切联系。我在江西时，他曾来信同我交换对时局的意见，我即以个人所见相告，希望彼此能进一步合作，共筹应付时局办法。经密函来往，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，另开局面，即：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，乘蒋调我攻粤机会，俟军队进入粤北，即急转潮、梅，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；然后推蔡元培领衔，我与择生共同署名，发表对时局宣言，呼吁和平，以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相号召；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，建立第三势力，以图控制整个局势。邓并通知我说：“陈诚是他的人”。我同邓计议好后，即同蔡元培联系，立得同意，他并派其秘书杨銓（杏佛）到吉安我军中密商。决定后，我又将全部计划通知蔡廷锴，并预先约定好通讯“暗语”。其时，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，择生有群众基础，我有军事力量，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，定可另开一新局面。这一密计的时间，大约是在八月上旬，距我到江西时还不到一个月。

九月中旬，十九路军在高兴圩与红军决战，战争告一段落。时蒋急于图粤，要我领十九路军打前锋，并派蒋鼎文部为后续部队（名为策应，实欲待广东平定之后，坐享其成，他以前之被蒋不次擢升，至此我方明白其用意所在）。我即下令将十九路军集中赣州，并另给蔡廷锴密令，说我三日内即来赣州，一切照计划行事（即我同蔡元培、邓演达合作的计划）。接着我又乘飞机到南昌见蒋介石，向他报告说：“我的部队已作好准备，即将回粤讨伐陈济棠，特来请示。”蒋很高兴地回答说：“你就照前定计划行事（蒋同我先商定好的图粤计划）先回赣州吧！”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

当我到南昌向蒋“请示”的那天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次日早饭后十时，我正要上车赴飞机场时（到赣州），突接参谋长熊式辉的电话，说有紧急事讲，蒋介石要我到总司令部去。我前去，直入蒋的办公室，见蒋及何应钦、熊式辉三人，呆坐一室，神气颓丧，面面相觑，形同木偶，我入内也没有人招呼。我很纳闷，心想出了什么奇祸吗？半晌，他们才拿出一通电报给我看，原来是张学良报告日军侵占沈阳的急电。我阅毕，极感震动，觉得形势极端严重，立即想到我同蔡元培、邓演达三人的合作计划，现应根本打消。我随即对蒋说：“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，强敌入寇，应当举国一致，共御外侮；而团结全国，首先要求全党团结；目前对西南对立的局面，必须由中央主动解除，争取他们言归于好，非常必要。”大家听了我的话，都默相首肯。蒋考虑了一下，随即问：“谁能去呢？”我立即答：“我是从广东出来的，当然我去。”态度十分坚定。蒋听了连说：“好，好！就这样办。我们就准备回京吧！”决定后，我同蒋及何应钦三人，于当日下午，搭上专

机，飞到了南京。当晚，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了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，主要讨论派代表去广东的问题。会议由蒋主持，首先由

他提出我的建议，全体一致赞成。接着有人提出说：“陈真如去是再好不过了，但还要派一二元老同去才好。”又有人提议：“请李石曾、张溥泉两先生同去吧（宁粤分裂初期，李石曾到粤进行疏解，但无结果）！”我因一向深恶李之为为人，故立即起来反对说：“如要派李先生去，我就不去。”大家问：“再派谁呢？”我说：“蔡子民先生最好。”有人又说：“蔡子民先生固然好，但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呢（时蔡因不满蒋之所为，早携眷离京赴沪）？”因我同蔡曾有过一段秘密合作历史，心想由我邀他，断定其必来，故说：“国难当头，如中央推定了他，我相信他是会来的。”大家完全同意。会散后，我立即致杨杏佛一电，请他同蔡明早一定来京。次日蔡果然来了，我即陪他去见蒋，经过几度会商。其时，因粤府（广东国民政府）发出马（二十一日）电，提出解决时局三个办法：“（一）蒋中正下野；（二）取消广东国民政府；（三）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。”因此蒋亦提出解决粤局的三个原则：“（一）如粤中能负全责，则中央同志，尽可退让一切，请在粤同志整个地迁来首都，改组政府，至中正个人下野，更无问题，只要粤中能切实负责，前来接代，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，此其一也，（二）如粤中不能负责，则应归中央主持，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，粤方同志，即应齐集首都，共赴国难，此其二也，（三）如要各方合作，则中正更为欢迎，但不必来京面商，方是开诚相见，同舟共济之邀，此其三也。”蒋另又写一亲笔函交我直交汪精卫、孙科等人，函中有：“弟当国三年，愆尤丛集，过去之是非曲直，弟愿一人承乏，谴责之加，何心复求推卸，……毋使五千年神明之胄，自我而斩；毋使亡国之惨史，将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，不怕国难之所致”等语。二十四日，我同蔡、张抵沪，并致粤方诸人一电，告之南下日期，要他们“命驾来港，共同商榷国家大计。”我们一行于二十五日乘南下荷兰船由沪赴港。

南下议和

我同蔡元培、张继等三人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，粤方派傅秉常（孙派）到码头迎接。粤非常会议正式派代表汪精卫、孙科、李文范同日到港，住九龙半岛饭店，我们立即前往会晤。我除当面递交蒋的亲笔函外，并把蒋的三个原则（详前）提出，汪等亦提出他们的马电三办法（详前）随即广泛交换意见，并详细讨论具体办法，惟未作出决定。次日，他们复到我们住的麦斯林饭店会谈，新由欧洲回国的伍朝枢（伍廷芳养子，胡派骨干，接近孙科）亦应邀参加，共同议妥办法两条，由蔡、张同我以艳（二十九日）电向、蒋报告，其要点为：“（一）钧座（指蒋）发一通电，为时局危急引咎，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，立即下野。粤亦发一通电，向国民引咎，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，赴京开会，取消国民政府（即广东新立的政府），并以钧座下野为条件，两电须同时发表，电稿均在草拟，容即电闻。目前两方均训令各级党部及报纸，停止两方互相攻讦之言论。（二）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备，俾粤方诸同志可以安心来京，在总理灵前，宣誓开会，决议统一政府办法。”

三十日，我们同汪、孙等人入广州，同古应芬、陈济棠、李宗仁等多人晤面，随即至退思园与粤方全体举行会谈。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我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淞沪警备司令，此为蒋得我们的艳电后，接受粤方变更京沪卫戍警备组织条件的表示。后粤方又要求调十九路军入京卫戍，作粤代表北来的安全保证，经电蒋后，亦得同意。此时双方表示尚好，和议颇有进展。后粤又提出蒋发表下野通电的日期，因而激起蒋之冲动，他给我们的电，重提他的所谓三个原则，并带着埋怨的口吻说：“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和无条件三字，而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电，未知何意？诚令人不解！且中正接兄等艳电提议后，故立任真兄为卫戍总司令官，此亦不愿有条件，渴望竭诚合作之意也。”事情发展至十月五日，粤方决不让步，非常会议决议：“（一）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；（二）全体联名请胡复出，函交陈铭枢代表带往；（三）本决议案由京代表电蒋。”同时广东国民党政府亦作出决议：“（一）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；（二）十九路军调宁后，粤代表北上；（三）俟在沪商有头绪，粤委始赴京。”

后得蒋复电，表示：“对通电原则（即蒋下野的通电）前已赞同，且早愿早发，无所犹豫，惟当此外外交紧急，亡呼吸之秋，不可一日无政府，此电文虽发，电后即未下野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入无政府状态，……如粤中同志能早到沪，或精卫、哲生、湘芹（古应芬）、君佩（李文范）诸兄先来亦可。诸兄朝到沪，此电夕发出。”此电为粤方最初允派代表赴沪和议的根据。六日广东非常会议发表麻（六日）电，强调“民主政治之先条件，在使武力受政治支配”；又提出四项办法：“（一）废除陆海空军总司令；（二）设军区，军区之划分，不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；（三）军需之独立，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、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；（四）国防统一于中央，保安属于地方”等等。至此，双方谈判告一段落。

接着，决定我先行回京，蔡、张暂行留粤，候胡汉民释放，得我获电后，粤代表始北上。我于十月十一日返沪，与顾孟余（汪派）、黄华表（桂系）同行。抵上海后，我对记者说：“本人至京复命后，蒋、胡当定期约粤方同志来沪会商，蔡、张两先生回来时，和平统一，即可实现。”其时，我对和谈甚感乐观，以为只要粤方能派代表来会谈，统一局面，不难立致，团结御侮，大有可为，故继又对记者表示：“本人就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时，即将辞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及国府委员，以免以军问政。”这是我当时主观的想法。

以上是我南下议和的简单过程。

蒋、汪、胡会见后的波折

此次宁粤分裂，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，我在南下议和中，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。十月十二日，我到南京，向蒋报告了议和经过后，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，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，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，故被迫答应。次日下午我即去见胡（时胡已由汤山迁回双龙巷住宅，有军警看守），递交了汪、孙等人联名信，并详述粤中情况，同时劝他捐弃前嫌，以国事为重，胡表示首肯。我随即劝他先去见蒋，他亦同意。我即陪同他前去，他们见面时，表现尚觉融洽，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。当即由蒋决定，推我及

吴稚晖、李石曾、张静江、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，候晤汪、孙等人，并欢迎他们入京，开和平统一会议。十四日晨，蒋又亲往胡宅拜访，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。此为胡自一九二八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。当时南京不少高级官员，每周末都要乘专车到上海租界去度纸碎金迷的荒淫生活，惟胡能洁身自爱，从不出都门一步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胡抵上海后，即致电唐绍仪、汪精卫、孙科等人，说：“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，然平日自检，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，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。”最后请粤方推代表来沪，进行和议。至此，粤非常会议乃正式决定派汪精卫、孙科、李文范、伍朝枢为代表（后加派邹鲁、陈友仁二人）同蔡元培、张继来沪，进行和谈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上海黄埔江中停泊了一艘外国邮船，载来了汪精卫、孙科等粤方代表，同行除有京方的蔡元培、张继外，尚有张发奎、唐生智等多人，连同随员共达一百余人。据当时上海报载，当天自晨六时起，江海关码头聚集欢迎者达数千人，反映了当时上海各界对于和平御侮的渴望。南京中央派来以于右任为首的欢迎人员甚多，并以贺耀祖任招待。船使入吴淞口时，我同上海市市长张群等人乘小轮直到杨树浦登轮迎接。汪、孙等登岸后，立即到胡寓与胡汉民会商。后蔡、张约我同到孙寓，详细安排蒋、汪、胡的会见。汪、胡、孙等住所，门庭若市，上海顿成政治中心。

二十二日，蒋介石乘飞机抵沪，立即同宋子文会商，然后才约于右任、蔡元培、张继和我晤谈。是日下午一时，蒋到孙科寓所与汪、胡等人会见，旋即正式举行会谈。出席者为：蒋中正、汪兆铭、胡汉民、于右任、蔡元培、张继、陈铭枢、李文范、邹鲁、伍朝枢、张人杰（静江）、李煜瀛（石曾）、陈友仁、邵元冲、孙科、林森等十六人。众人入座后，由胡请汪先发言，汪起立说：“同志们年来隔离，致行动冲突，但系为公，非为私。此次代表粤方同志，为解决一切，共赴国难。”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：“（一）国府组织宜如德、法总统制，由行院负政治责任，（二）废除总司令职；（三）由一、二、三届中委任党事。”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，表示赞同。蒋继起发言，先赞成汪发言，并说：“本人亦如是，公而忘私。”又说：“诸同志皆党中前辈，本人为后进，向来服从前辈。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，凡胡、汪先生同意的事，我无不同意照行；若我不行，尽可严责。”言毕，李石曾发言，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，主张大家马上入京，无须在沪会议，蔡元培、张继等即表同意。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：“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，须照预定程序，议有端倪始可入京，否则须电粤府请示。”汪随即说：“入京本无不可，不过现下若入京，则协议签诺之事，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，反为不佳。”蒋对汪言，表示谅解，赞在沪会议，并说：“胡先生可代表本人。”继又叮咛地说：“胡、汪先生同意的事，无不照办。”在会议中并正式决议两点：“（一）彼此须求得外交一致，共赴国难；（二）关于党政军问题，由京派代表与粤方代表在沪详商办法，俟将草案拟定，再入京开正式会议，谋彻底办法。”谈毕，蒋即赴龙华机场，乘飞机回南京去了。此次会议共历三小时。

此次蒋、汪、胡三人的会见，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又一次的动荡。自一九二六年秋，胡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赴苏联时起，他们就开始参商。汪自中山舰事件发生后，悄然离粤，

中间经过宁汉分裂、扩大会议、非常会议三个阶段，与蒋对抗；胡自宁汉分裂起，至他被蒋扣留止，中间与蒋两次合作。此次三人会见以后，蒋、汪曾有两次合作，在抗战中汪出走作了汉奸；胡在此次和谈中赴粤，一去不返，继续凭借陈济棠以抗蒋，以终其身。这短短三小时的会见，是他们在此六年间仅有的一次，也是他们毕生的最后一次。

根据此次会议决定，在上海召开宁粤统一会议（即上海会议）粤方代表为汪精卫、孙科、伍朝枢、李文范、邹鲁、陈友仁；京方代表为李石曾、张继、蔡元培、张静江、陈铭枢、吴铁城。会议在二十年前南北议和（即唐绍仪、伍廷芳各代表民国、清廷在沪议和）的伍宅（伍廷芳私邸，为伍朝枢继承所有）举行，共开了七次会议。会议前和会议中发生了许多波折，粤坚持中央政制改革和一、二、三届中委决定党事两提案，京方则坚持政治主张必须根据建国大纲及约法，并强调党的法统，不容紊乱，以与粤方提案针锋相对。就是说，粤方一定要蒋下台，京方一定要蒋呆下去，双方勾心斗角，极尽诡谲之能事。自粤方提出党政改革提案后，蒋公开翻脸，继则因京方“某中委”（吴稚晖化名）发表讽刺粤方谈话，因而引起蒋、胡交谪，舌战唇枪，互不相让，至开第五次会议时，和谈遂告中断。后经张继等人的斡旋，继续开了第六、第七两次会议，最后决定京粤双方同时召开四全大会，草草结束了这次会议。

双方分别召开四全大会，已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，而粤方召开的四全大会，竟在会上大演“全武行”，部分代表宣告退席，粤方内部再告分裂。后来汪派代表又在上海“大世界”开会，选出中委十人。广东选出中委二十二人之后，大会即行结束。

先是，上海会议决定京粤分别召开四全大会时，曾推孙科、李文范、陈友仁回粤报告，后因粤方内部分裂，孙科负气赴港转澳门，汪、胡等乃在上海集议，决定推胡回粤解释。胡行前对人说：“此行责任重大，决只到港，不进广州，若两派不能一致，本人决不返沪，就将赴欧养病。”胡之缺乏政治担当，由此可见一斑，他之一去不返，促使了蒋、汪之合流。

蒋介石被迫下野

四全会结束后，主要议程就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。此时，蒋介石如再不下野，粤、沪两地中委仍不愿入京开会。自胡南下后，广东方面的态度更转强硬，粤曾用常会名义作出决议：“至二十日（十一月）若蒋下野事未办到，即在粤召开一中全会。”至此，蒋方表示愿意立即下野，并同意粤方提出的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。

其时，另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全国学生的抗日运动，波澜壮阔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巨流。首先是北平九大学的学生二千多人，发起赴京请愿，要求搭车南下，路局拒不开车。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说：“宁可停车，不许通行（可见蒋是何等的怕学生请愿）。”僵持达数日，平、津铁路交通完全断绝。后张再与蒋电商，始行挂车运送，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的学生，胜利地到了南京。不久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九个大专学校的学生，共达一万多人。他们到国民政府请愿，逼着蒋硬着头皮出来接见，后又到中央党部请愿，值中

央常会开会，大家推蔡元培同我去见，在群情激昂中，蔡同我均被殴。

在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前，蒋已决定辞职，他曾约于右任谈话，并派我同何应钦赴沪，促粤中委入京主持一切。

十二月十五日，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，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，于右任主席，决议案：

“（一）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；推选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、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。

（二）考试院长戴传贤、监察院长于右任、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，决议慰留。”

会后蒋发表辞职通电，略谓：“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，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，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，共赴国难。胡汉民同志等微（五）日通电，且有必使中正下野，解除兵柄，始赴京出席等语。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，和平统一方能实现。权衡轻重，不容稍缓须臾，再四思维，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……”

同日，林森同我联名发表就职通电，大意为：“对于施政大端，一切维持现状，无所更张。即望第四届第一次全会早日开会；政府正式改组，俾完成党国大计。”

我之被推为代理行政院长，全属于粤方的主张，而蒋亦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，且早已说明是过渡时期的“看守政府”性质。此种趋势，客观上早已形成，无可纪述者。惟林森之代理国府主席，且由此一直蝉联到他的死，为时竟达十二年之久。在他被推选时，是出人意料的，因林与蒋本不甚密切，在宁粤分裂时，他还是弹劾蒋的四监委之一。因其中尚有一段史话，外间尚鲜有知者，特在此纪述之。

当第二次讨袁（世凯）失败，我同林森相识于上海，他同我的几位朋友都很相契，我很喜欢其恬退淡泊及其山林隐逸的风貌。我以后无论在南京或上海，总喜欢同他清谈，有时同逛夫子庙（南京）、城隍庙（上海）；看他搜集了许多假古董。宁粤分裂时，他本在海外，被列名参加弹劾蒋的提案。上海和谈时他始归国，随即到南京，不预闻宁粤任何一方的争议，表现了他的超然地位，但并未被蒋重视。当蒋决定下野时，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，他向我提出将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。我初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，以为只是偶尔谈及，故说：“于先生固然好，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，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？此人既有清望，又没有各方面政治背景，完全符合粤所提的主席标准——年高德劭。”蒋急问：“是谁？”我答：“林子超（林森字）。”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：“林一向爱清闲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？”我说：“我可以劝驾。”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，交我面递。林因事出意外，开始尚有顾虑，经我劝说，他答应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蒋早已属意于右任，且有种种迹象，如汪，孙到沪时，蒋即派于为欢迎的首要人员；蒋、汪、胡在上海会见时，参加者名单，于名列前茅；蒋辞职前夕，特约于密谈，等等。因我心粗，且因和谈事双方奔走，故未暇注意及此。林自正式任主席后，参军长吕超是由我推荐的，侍卫长由我的侍从副官充任。

蒋被迫下野前，早有卷土重来的打算，故设下重重陷阱，使后来者难乎为继。就在他

辞职那天，他还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，决议改组苏、浙、赣、甘四省省政府，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，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，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（时因孙蔚如部入甘，孙兼任甘肃省主席，杨虎城因某种原因，觉得困难，故电蒋荐邵为甘省主席，此时乃一并发表）贺耀祖任甘宁青宣慰使。

最阴险毒辣的是他还枪杀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。邓在上海被捕时，我正在江西指挥军事，距离我同他密谋合作的时间甚近，但他的被捕消息，是我到了京沪后才知道的。其兄演存屡向我探听消息，我还说：“照目前蒋的情况（逼着他要下台了）看来，他还不肯下毒手。”且我十分相信择生对我说的“陈诚是他的人”，以为陈总会暗中维护，故很放心。同时我又深知蒋之残忍成性，凡被他扣押的人，若有人出面营救，只会促其早死（实例甚多）。有人曾这样设想：在和谈中若果由粤方代表营救，蒋会被迫接受。但应知粤方诸人，特别是汪精卫恨邓之深，并不下于蒋（邓曾公开骂汪，说汪除“倒蒋拥蒋之外无主张”），他们不送“催命符”已算好了，遑言营救？我事后得知，蒋杀邓时，曾组临时军事法庭，由恨邓最深的吴稚晖、戴季陶、何应钦审讯。我闻择生凶讯后，惊悼异常，只得给资交其兄演存，收殮遗骸葬于南京麒麟门外，并亲书“故友邓择生之墓”树碑志之。

我代理行政院长职务，为时甚短，约有数事可纪：

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，莫不纷纷辞职，无论是否批准，是否有人接收，都先一走了事。外交部长顾维钧，留下辞呈径赴上海去了。财政部长宋子文向我提出辞呈，声明只负责到一中全会开会时为止。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，都同时总辞职，各署长已不到机关办公，纷纷作鸟兽散。

在此期间（或以前），行政院曾接到溥仪自天津来电一通，表示内向，并请示行止。我记得在行政院国务会议（或中政会议）讨论过。记得当时大家都以溥仪为一“皇室”“扈从”人员必多，政府很穷，没有这笔钱来做接待费，竟搁置起来，并不答复。最近我曾托载涛委员询问溥仪对此事的回忆，据复，溥本人对此已记忆不起。又查“中外历史年表”载明：“日本特务拥清废帝溥仪至东北”，为十一月间事。此事如不在我代理行政院长中，则当在以前，因我为中政会议委员及国府委员，重要会议我均参加，至今对此事记忆犹新。这是国民党对人民的一大罪行，也反映了当时南京政府的腐朽以及当权者之昏庸误国。

四届一中全会

自蒋介石下野后，各地中委纷纷入京，孙科偕粤方中委同日到中山陵谒陵后，并与蒋晤谈，惟汪、胡均称病不来。十二月十二日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，到有中委九十人。蒋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以后，就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，随即回他的老家奉化去了。蒋行前曾约陈公博、顾孟余、王法勤谈话，说：“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，任此艰巨。前在沪时，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，汪太客气，希望三位再代转达。中兴本党，非汪先生莫属。”此为蒋、汪后来在烟霞洞会议的伏笔。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、何应钦、孙科等人，说：“全会既开，弟责即完，故须还乡归田，还我自由”并说：“此去须入山静

养，请勿有函电来往，即有函电，弟也不拆阅也。”次日，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。蒋走后，一部分中委力主蒋回京，有主以大会名义“促驾”者；惟另有一部分中委认为可遵蒋意，予以“休养”机会。

在首次大会那天，有名在案的“某中委”吴稚晖又大放厥词，他说：“蒋一再声明亲自北上，收复失地，而北上种种亦有相当布置，今彼辞职还乡，个人认为实不该准其辞、让其走，今日上了他的当”云云。在讨论东北事件时，吴又说：“东北事件非张学良酿成，系由于国内有卖国贼，此贼即在眼前。”粤委认为吴是指摘粤委中人，又因吴曾电张学良为蒋打“抱不平”，中有“外不见容于强盗倭寇，内不见容于卖国之贼”等语，故认为吴语言闪烁，用意奸险，显然别有用心，因而群起表示不满。孙科于散会后，愤然乘车赴沪，随即发表谈话，说吴“含血喷人，蓄意中伤”，并表示如蒋、汪、胡不入京，“只有暂不问党事。”

自蒋离京，汪、胡又裹足不前，孙科已成了南京唯一重心人物，且宁粤双方早已协议由孙组“统一政府”。现孙拂袖而去，京方中委亦感不安，故即派于右任、何应钦、蒋作宾等人赴沪劝孙回京；一面又派人劝吴稚晖不要再随便发言，一场意气之争，始告平息。

二十六日开第三次大会，决议要案：“（一）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案；（二）通过国民政府主席选举标准，以年高德劭者选之。”

二十八日举行末次大会，通过决议案如下：

“（一）推举胡汉民、汪兆铭、蒋中正、于右任、叶楚伦、顾孟余、居正、孙科、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，并以叶楚伦为秘书长。

（二）选任国府主席、委员及五院院长案，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，提出声明两点：（1）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、委员长不兼国委；（2）现任军人不兼国委。众无异议。

（三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。

（四）选任蒋中正、汪兆铭、胡汉民、唐绍仪、张人杰萧佛成、邓泽如、谢持、许崇智、王法勤、李烈钧、邹鲁、邵元冲、陈果夫、叶楚伦、宋子文、王柏龄、方振武、熊克武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赵载文、王树翰、刘尚清、薛笃弼、柏文蔚、程潜、经亨颐、孔祥熙、恩克巴图、杨成堪、马福祥等三十三人为国府委员。

（五）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，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；张继为立法院长，覃振为副院长；伍朝枢为司法院长，居正为副院长；戴季陶为考试院长，刘芦隐为副院长；于右任为监察院长，丁惟汾为副院长。

（六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：（1）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委监委组织之；（2）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，开会时轮流主席；（3）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。

（七）选举蒋中正、汪兆铭、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。

（八）关于国难会议、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，决议：（1）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內召集，讨论御侮、救灾、绥靖各事宜；（2）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，由中常会筹、议办理；（3）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，筹备召集

国民代表机关，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。”

一中全会闭幕时，冯玉祥始到京，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，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。他在会上发表演说，说：“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，责骂自己对不起国家，痛自忏悔。党中先进同志，汪先生学识宏富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，玉祥自己是混账。蒋先生有其长处，有其短处，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，有海枯石烂，此志不渝，结果竟自打起来，致成今日之局。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，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。”这种坦率的语言，为全会带来了新的气氛，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。

会后，第一次中常会决议：新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，副院长定于次年（一九三二年）元旦举行宣誓就职。接着，中政会议行政院各部人选如下：

内政李文范、外交陈友仁、军政何应钦、财政黄汉梁署理、教育朱家骅、实业陈公博、交通陈铭枢、铁道叶恭绰、司法行政罗文翰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、参谋总长朱培德、训练总监李济深、军事参议院长唐生智。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刘瑞恒。

所谓“统一合作”政府，至此始正式成立。

孙科政府种种

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、汪、胡为中政会议常委，又为中常会、国府委员，形式上表现他们的“合作”，但蒋对于军政大权，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。更由于蒋赴奉化，汪病上海，胡滞香港，他们三人之间，神既分离，貌又不合，以至孙科组织的号称“合作政府”，实际上是合而不作。兹将这一阶段的情形，简述如下：

孙科政府既组成，蒋、汪、胡仍天各一方且互相牵制。时林森曾致电胡汉民说：“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，素为公所爱护者，今既然不避艰险，肯牺牲一切，公而忘私，我辈深嘉其志，尤表同情，似不忍袖手旁观，任其焦头烂额，而不加以援助。”以“焦头烂额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情景，确属事实。其时，我曾致电蒋、汪、胡，其中有：“政府虽告成立，而我重要领袖，犹天各一方，未能荟萃，致使党政最高机关，提挈无人，失其重心，一切安攘大计，何所秉承？”又有：“铭枢负调护使命，从斯即以不加入政府自誓，和平观成之日，即役人卸责之时。嗣因我重要领袖谦让不过，哲生同志受各方敦促，出膺艰巨，以共同负担相要，京方同志亦以此相督责”等语。表明我之参加政府，“乃临时迫于牵率”，且已明知：“以个人利害言，不免徒作牺牲，以时论是非言，岂能尽求谅解。”故在单独致胡的信函中说：“铭枢为求领袖团结而来，非至困结果真绝望时，不敢言去，殆至力尽能竭，贡献无路，然后奉此待罪之身以退，付诸国人论制。”

其时使我感到差强人意的事，就是慨然南下的冯玉祥，与我的意见颇为接近。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，旋即到沪晤汪。冯对人说：“此次南来目的，完全想团结同志，以谋抵制暴日，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。”又说：“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，当劝其速入京；对胡亦同样希望，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；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，共赴国难。”冯在此期间，对团结合作，极为努力。

在一片劝驾声中，蒋、汪、胡仍无入京表示，孙科于一月八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：“愿回粤一行，促胡北来。”于右任等力阻，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，不能离开。孙说：“将短期离京，到奉化请蒋，到上海请汪。”各方仍多方劝阻。散会后，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。事为居正得知，立即赶到车站，时车已开动，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，旅登车劝阻。孙坚决表示：“本人将胡、汪、蒋一齐拉到南京，以求达到真正团结之目的。”孙到沪后，即电胡速驾，又准备到奉化劝蒋，因未得蒋肯与接见的复电，故未便成行，乃改派何应钦、居正前往。此时的孙科真是旁皇失措，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。

一月十一日，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，先叙述近日奔走情形，并说：“看现在情形，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，渐至山穷水尽，如革命重心不能建立，听其沉顿下去，即将无声无息地完了。我们必要挽回逆流，重新激起，否则便无法挽救。”其时我对蒋、汪、胡的袖手旁观，已大感愤慨，故又说：“万一三领袖不来，或迟迟其来，重心不立，政府不固，我们也不能等死。无论如何将撑起来向前拚命，为党国争人格，为民族争生存，成败利钝，生死存亡，在所不计。如不能复活民国十四、五年的革命激情，这个退潮，就挽不起了。大祸临头，追不及待，大家要一齐振作起来，去求我们的生路。”当时我已意识到中政会之常委如再不来，只有重建政治重心，此为后来与冯玉祥、李宗仁等合作，组织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张本。

第二天，孙科同我便在沪约集了邹鲁、李文范、陈友仁、马超俊、冯玉祥、李济深、李宗仁、吴铁城等人会商，决定蒋、汪、胡不能入京时，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，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。会谈后即一同入京，召开第二次中常会，决议：

“（一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组织大纲；（二）推于右任、张人杰、张继、居正、孙科、陈铭枢、朱培德、何应钦、冯玉祥、李济深、李宗仁、陈友仁、顾孟余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。”

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：“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责任以前，为应付国难，迅速处理政务起见，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，负其责任。但关于重要方针，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。”其中“但书”是于、张（静江）等人的意见。至此孙科政府虽有较能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，但仍有种种限制。

在四届一中全会前夕，京方中委会商，讨论接受粤方条件——以孙科继任行政院长的问题时，担任南京市长的石瑛，就挺身而出反对，终因是粤方提出，仍得多数通过。石为同盟会员、老留英学生，以刚劲不阿称于世，我素视为畏友。故会后我即前往拜访，意在疏解。石见我时，声色俱厉地责备我说：“真如先生！行政院长由你来担任就好。孙科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事，这岂不是儿戏吗？”我只好以“委典求全，力谋团结，共赴国难”应之。我又说：“孙是粤方提出来的，不答应不行。我本想新政府成立时，即摆脱政务，专任军职，才合我保证人的地位，但孙坚要拉我参加政府，否则就不干，我为了贯彻初衷，故只得硬着头皮同孙合作。”石听完了我的话，喟然叹了一口气，默尔而已。

财政外交逼孙科下台

根据上述种种，孙科政府之难乎为继，早已在意料中。若果孙稍为有点儿担当，情况并不是不可改变的，最低限度也不会那样短促，即告夭折。兹将当时最感棘手的财政、外交两方的情况，分别概析如下：

当时的财政，正如孙科所说：“以言财政，几年来债台高筑，罗掘已空，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万万，但除还债外，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。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，且市面债券价格，不过二三成，即强发债，于事何补？最近财政、税收，每月不过六百万，而支出方面，只军费一项，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，每月仍须一千八百万。”其时，广东目扣留税收后，旧扣未还，新税仍继续扣留；自东北失陷后，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，且每月不敷甚巨；湖北何成浚截用江汉关税；山东韩复榘截用国税；福建地方截用统税，……税收情况，极为混乱。

自宋子文下台时，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，未得分文现金，而宋仍拖欠了银行界一千万。因蒋宋事先各种布置，银行界人物又多老奸巨猾，拒不与政府合作。黄本人为财政界后进，资望甚浅，唯一希望是新任财次林康侯为之策划；但林本人并无特定银行做背景，故亦孤军无援。黄第一次到沪，曾想筹款一千万，经多方设法，只得三百万，照中央军政费二千二百万计算，仅够四天开销。加以各军代表四十多人，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。种种情势，使孙科和我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。

当我们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，曾拟议提用公债基金，暂行停付内债本息。当日参加会议的人不多，除粤方中委外，另有冯玉祥、李济深、李宗仁等人，京方仅我同吴铁城两人。不料上午刚有此初议，下午就有银行界代表向孙科质询，孙未作正面答复随即返京。第二天，上海银行、钱业两公会发出通电反对，北平，天津银、钱业亦通电反对。同时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，证券商人公然提出维持内债信用办法三项：“（一）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；（二）对于现在经收税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委员会之负责人，责成负责遵守政府从前法令；（三）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，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。”这是上海商人对政府提出的哀的美敦书。事后得知，上海银行界的消息有这样灵通，是因有吴铁城在替他们当坐探。

黄汉梁、林康侯均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，当日提出辞呈，孙科也跟着不辞而跑到上海去了（孙象这样不辞而去，先后共有几次）。我闻讯，即乘飞机到沪找孙，见面后，我问：“你怎么又走了呢？”他说：“上海银行界不支持，财政无办法，黄汉梁又辞职了，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，我没有办法。”我说：“笑话！政权在我们手里，操刀必割，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？”他又说：“谁来当财政部长呢？”我说：“我早同你说过，我既被拉入了政府，你纵有何苦难，我都愿意替你承当！财政部长没人当，就让我来好了。”孙听了如释重负地说：“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。”我们这席谈话，仍然象上次会谈一样，消息象风一样传出去，真是“不胫而走”，立刻传遍了全上海和全国重要城市，乃至港、澳地区。当天下午我就接到香港作寓公已久的梁士诒（交通系领袖）来电，大意是：“陈将军，你是军

人，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（意思是军人不能作财政部长）。”这种半忠告，半是恫吓的电文，我并没有理会。第二天早上，吴铁城在他家中约集各方面的代表同我见面，到有：银行界代表张嘉璈、钱业代表秦润卿、市商会代表王晓籁、债券管理委员代表李铭、持券人代表杜月笙、张啸林及报界代表史量才等十余人，都是当时上海租界的所谓“大亨”，也就是“地头蛇”。我到后刚坐下，他们先向我表明态度，说话的内容，大体同梁士诒的电文相似。我说：“问题很简单，这件事是起于你们，不是起于政府，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政权，不能因为你们不合作而垮台。我们是革命政府，事情办不通，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来处理。如果你们愿意同政府合作，我还有什么话说呢？诸位想想：我是当财政部长的人吗？解铃还是系铃人，现在政府是否收回成命，全在于你们。”这班人听了我的话以后，纷纷起来表示：“愿意同政府合作，并欢迎黄部长复职。”我答复说：“那就好办。”

此后，张静江又托张群、吴铁城同各方代表会商，最后决定每月由上海银行界与证券交易所共同负担九百万，加上政府每月可收入的国税（关余、盐余）有七百万，共一千六百万。照当时军政费预算，虽然还不够，若再裁减一些军政费，也尽可维持。

当时，立法院副院长覃振曾就此事对银行界表示不满。他说：“当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，一年间发行公债三万万供军费，当局不顾国库损失，以半价抵销，上海银行界利用机会重利盘剥，对政府视同愚主，数年获利，已甚可观。”又说：“中国资产阶级，平时为政府承销公债，重利盘剥，乱时为私利反对政府，将款存入外国银行（时上海财团将现款存入外国银行达二万万），真象犹太人，国可亡，私利不可争。”真是一针见血之语。

其次，关于外交方面：自东北事变后十日，南京学生请愿团因激于爱国热忱，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伤。王辞职后由施肇基继任，时因施尚在国外，蒋即以顾维钧署理外长，留施在日内瓦与国联交涉。当时政府的外交政策，简言之，就是“不抵抗”三字，开始时就完全依赖国联，以为国联万能，可以主张公道，进而制裁日本，竟向国联提出：“日本不撤兵，决不直接交涉，”以示依赖国联之专。后顾又公然自动提请，将锦州划为“中立区”，置东北广大沦陷区于不顾。为了要叙述孙科政府的外交政策，故必须进一步将蒋、汪、胡三人的对日本主张，加以概括的说明。

顾维钧就任外长时，蒋介石曾亲书训词，大意为：“今日之对外，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，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。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，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求和。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。”这就是蒋后来的“攘外先安内”与“安内重于攘外”的“理论”根据，也就是他后来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。汪精卫在上海会议时常说：“余前曾反对南京政府，但是因民主政治而反对，非因外而反对（意为非对外问题而反蒋）”。自他公开与蒋合流后，即高唱“一面交涉，一面抵抗”与蒋的“三日亡国论”相呼应。在他破坏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后，又亲自进行了许多投降外交，最后终于公开投日，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。胡汉民的对日态度，虽貌似强硬，如他说：“应先确定坚定原则，即绝对不屈服于任何暴力”与“不能不有拼命之决心与准备。”后来他在香港曾发表一些抗日言论，以及谴责蒋、汪的媚日政策，但

都是隔岸观火的空谈。他还有一套理论——三民主义之链锁，即：“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，非反蒋不能实现民权主义，非剿共不能实现民生主义。”可见他们在对日问题上，表现上虽各有不同，而究其实际，则全属一致，即“对外不抵抗，对内不妥协”，集中到一点，就是决不放弃那面早为人民所唾弃的“反共”的黑旗。

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，是孙科手中的一张王牌。陈在北伐前曾任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，同英帝国主义办理过沙基惨案的外交。后北伐军攻下武汉，他在收回汉、浔英租界的交涉中，由于有广大人民做后盾，北伐军的先声夺人，获得了外交上的胜利。据当时报纸记载，陈与英代办阿马利谈判时情景，说陈“胆壮气盛，使英入神为之摇”。可以看出，陈在外交手腕上的运用，确有其独到之处。由于我国近一百年来的外交史，实际是辱国史，陈当时有此成就，时论推他为革命外交家，人们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。

陈于宁粤分裂前数月回国，曾携其新夫人张荔英（张静江之女）到上海、南京一行，意在探亲，旋即入粤，参加非常会议，并任粤府外交部长。后陈曾被派赴日本，到东京后，日政府表示，南京抗议已到，故未便正式接待。陈与日外相币原私人接触，已感觉日对华已有决心，不愿与中国谈问题，故匆匆回国。当“九·一八”事件发生后，陈致电责币原说：“前游日本时，在东京面谈，执事谓满、蒙为中国领土，日本当尊重中华领土之主权。今突然派兵占领东三省，此种举动，是否与执事前言相矛盾。”后南京吴稚晖等人，曾借此攻讦粤方，说陈之赴日是出卖东北；后又把陈所坚持的对日政策，说成是陈有意洗刷个人名誉，这是怪诞不经之谈。查币原本日政府的“文治派”，其对华政策虽同以后侵略为目的，但在具体措施上与军阀是有出入的。当日军占领东北时，币原曾说：“日本吞并东北，等于吞了一枚炸弹。”后币原为日本军人毒死。

在陈友仁就任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长前夕，曾发表谈话说：“锦州事件在今日以前，尚为过渡政府之责，本人不负任何责任，必自明日起，方为新政府责任。但本所知可得言者，过渡政府对锦州曾责令张学良坚守，昨日仍有电令张，无论如何牺牲，必须坚守。新政府成立，亦必须继续令张坚守。”陈正式就任外长职后，即发表宣言，仍重申政府决令张学良坚守锦州。后因日军节节进逼，锦州失守，张学良军全部撤入关内；益以日本发动其侨居上海的浪人，烧毁代表我国民族工业的三友实业社，直接威胁东南沿海各地。于是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。此一方针提出时，蒋、汪已赴杭州会谈，后即相继入京。

一月二十四日，南京召开中政会议特务委员会，蒋、汪同时出席，讨论对日问题，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。惟蒋、汪二人发言最多，论调完全一致，都认为：“已往既不能战，又不能和，今后将以国家百年大计打算。”并说：“陈的外交政策，是不懂国情，徒作孤注之一掷。”继又表示：“决将以忍辱负重、脚踏实地之精神，为有效而努力。”此种论调与曾国藩、李鸿章当时之言论相同，因他们都是勇于私斗，怯于对外的“异代同工。”

同日，陈以他的外交方针未被采纳，愤然辞职，与孙科一起赴沪。陈至沪即发表声明说：“过去蒋介石对东三省事件，原是一贯主张其消极不抵抗政策之故，以致锦州失陷，而中国军队且全部撤退于关内，外交问题至是乃愈陷于困难……。余经两星期之考虑，以

为贯彻和会所决定之政策，则对日绝交之事，实为必要而不可避免之方法。惟此外交政策，为蒋历来所反对，其最近发表对日问题之讲演，以对日绝交为中国之绝路，其论断之坚决，且无磋商之余地，使余对外方针之进行，受严重之打击。余敢警告国人，蒋氏此种消极政策，如更进一步，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，对于全国人民为日人暴行引起之抗日救国运动，加以武力之压迫。蒋氏至今实力犹存，而其反对余之外交主张，又若其坚决，此余所以不能不辞职以谢国人也。”同时，孙科亦向国府辞职，其致蒋、汪电中有：“溯自受事至今，已将一月，而最关重要的外交方针，迄未能有所决定。该部长陈友仁亦以贡献之对日政策，未蒙中央诸同志采纳，今已提出辞职，虽科再三挽留，而去志弥坚，未可相强”等语。

孙辞职后，所谓“统一合作”政府，即宣告垮台。

烟霞洞会议

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，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孙科、张继、张静江五人，在杭州西湖风景幽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。蒋、汪合作，孙科政府垮台，以及此后蒋、汪在内政、外交上的种种措施，均以此次会议为起点。其中内幕，我虽然微有所闻（如蒋在此发表“三日亡国论”），但其究竟，惜未亲自参加，故难臆测。兹将所搜集的当时报刊记载，加上个人回忆和最近朋友们补充的材料，略加整理，简述如下：

一月十二日，孙科同我在上海会商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之次日，蒋就由奉化到杭州。十五日我得蒋电召，即同范其务（前广东财政厅长，后任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处长），由京飞杭。其时到杭州的人甚多，内有顾祝同、贺耀祖等，我见蒋后，将京中情况向他报告，并说明特委会之设，仅在中政会三常委不到京的情况下，便于迅速处理政务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蒋对我的谈话，并没有不同意见的表示。当夜十时，我同张群乘火车返沪。车抵笕桥，蒋来电令折回，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，重到澄庐晤蒋，他书亲笔函一封，交我携沪转汪。十六日至沪，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，我随即回了南京。

汪得蒋函后，当天下午即赴杭，行前发出两电，一致胡汉民，一致孙科和我，说他已应蒋邀赴杭，当晚蒋、汪晤面。次日蒋、汪合电致孙科，说他们将候胡来后，即联袂入京，并要孙电胡速驾。同时，蒋、汪又合电致胡，请他北来，“一同入京，协照哲生及诸同志。”十七日胡复汪电，除称病谓“非长期休养不可”外，并谓“只须中央责任内阁之职权，必能发展开一新局。”

十七日，张继、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，当晚与蒋、宋（子文）密谈。次日上午，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，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，说蒋、汪有要事相商，须立即前往。孙即与何应钦、吴铁城同去（事后我始知悉），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，即赴烟霞洞。其时正为张继、张静江宴在杭各中委，蒋、汪均在座。宴毕即在别室密谈，参加者有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孙科、张继、张静江五人。此即后来所谓的“烟霞洞会议”。

会议内容，秘而不宣。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，孙答：“圆满，圆满。”又问：“何

时回京？”孙答：“就去。”孙在杭呆了两天，二十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，二十一日蒋直接由杭入京。此时蒋、汪分别发表谈话，论调完全一致，一拍一合，俨似表演双簧（最近贺贵严委员提供一段当时的秘闻：汪先曾派其妻陈璧君出面同蒋密谈，提出蒋、汪的上台，应出于互相推重，以坚蒋之信任，汪曾表示：“誓不一个单独入京”）。原来蒋、汪之间，在此以前已在暗中勾搭。

自蒋、汪先后入京，二十二日在京中委齐集励志社会谈，开始时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、熊式辉电报前方“剿赤”军事及军实问题，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，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。报告毕，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。数分钟后，蒋起立发言，说：“关于对日问题，无论和与战两办法，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。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，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。”二十三日蒋、汪、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，达三小时，闻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，反对者居多。二十四日开特务委员会，蒋、汪二人多言最多，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，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。当日陈提出辞呈，与孙科一同赴沪，旋孙亦辞职。以后中执会、中常会均有电致孙，请打消辞意，并派居正、张继、张静江赴沪挽留。后又派何应钦、吴铁城前往，以孙行踪秘密，终日寻找不获。

二十七日中政会议开会，到会委员六十人，汪精卫主席，决议要案：

“（一）”函中央执行委员会，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，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；

（二）成立外交委员会，选出委员人选，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，顾孟余、顾维均、王正廷、罗文翰为常务委员。”

二十八日开中常会，对陈友仁在上海所发表的谈话，以其忘却党员立场，外长非责任内阁比，外交部以上尚有中政会决定方针，不能以政策不行而走；以党员论，为干犯党纪，以国民论，为丧心病狂，决交监察委员会惩戒。

同日，又开中常会，蒋中正主席，决议：

“（一）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，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；

（二）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，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，孙科未到职以前，由覃振代理。”

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数小时以后，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，在全体人民推动下，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。

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于北京

（本文按广州市黄埔区政协副主席秦庆钧教授影印件抄录，编者略有删节。）